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生态环境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民族的凝聚提供了重要支撑

曹津永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深刻影响着文明兴衰演替。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与生态环境紧密关联,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都共同印证了生态因素在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的起源,发展壮大到“多元一体”的共同体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探讨生态环境因素与中华文明整体发展及其变动的关系,形成生态环境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整体认知,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如何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多元一体”发展的全过程,始终与生态因素紧密关联。无论是“农牧交错”的北方文明发展主轴,还是“黄河轴心”时代的终结与经济、文明重心的南移,以及南方开发的梯次推进,都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调试和变迁息息相关。

中国各区系文化类型基于各自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产生了具有自身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文明因素。在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因素绝非封闭孤立或步调一致,而是呈现着碰撞、交流、融合,或快或慢,或上升为主体文化而表现出更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或融入主体文化,成为共同体共享的文明因子。

我国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在多元的基础上又具有整体统一性。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家骥的研究指出了其中的关键:首先,由于中华大地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自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使我国各民族内向发展比外向发展更为容易。在古代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外向发展从未成为主流,外部影响也未去占据主导地位。各民族内向交往的山水阻隔和交通不便的困难,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被克服。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各民族



中华文明多元起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多元起源和多区域、多中心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华大地成为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文化

多元起源的格局,便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全国各省区的大量发现而日趋明朗。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把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文化区:一是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东北、西北)地区;二是

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三是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四是以湖北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五是以苏(江苏)、浙(江)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六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包括东南沿

海、岭南、西南几省)地区。从而,大体上勾画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多区域、多中心发展的格局。正是适宜的地理生态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等生存条件,人类得以生息,文明得以发展,孕育了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满天星斗”。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的先民就利用山脉走向、江河冲刷切割所形成的天然通道,闯出了多条由东至西,由北而南的民族迁徙“走廊”和经济文化交流路线,著名的有中南走廊、南岭走廊、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内蒙古走廊等。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历代中央政府又动员全国力量修建了许多官道、驿道、栈道等,大大方便了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其次,我国天然形成的自西向东落差显著的三级阶梯地形,为周边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汇聚提供了便利条件。

受我国自然地理环境东西、南北交汇和多元文化汇聚的影响,中原地区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成为远古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核心地区。随着这一先进核心文化向四周的辐射与扩散,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便日趋增强和巩固。我国特殊

的地理气候条件,自然形成我国东西、南北两条地理过渡带:一是东部季风区与西北干旱区和西南青藏高原之间东西过渡地带;二是南方温暖湿润区和北方半干旱温暖湿润区之间的南北过渡地带。这两条过渡带恰恰就在传统所认为的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即今日的西安—洛阳—开封一带,在空间上交汇形成一个巨大的“十”字结构。我国所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就集中分布在这个“十”字结构的纵轴上,南端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中间是80万—75万年前的蓝田人,北端是70万—50万年前的北京人;中华新石器文化中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新石器文化,则集中分布在“十”字结构的横轴上,西边是黄河中游文化,其序列是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东边是黄河下游文化,其序列是青莲岗

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而过渡带的地理条件多样,有利于农业发展,在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促使中原地区能在中华文化多中心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率先崛起,并在周边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过程中脱颖而出,逐步成为中华文化核心地区。这个核心一旦形成,便以其较高的经济文化优势向周边辐射与扩散。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随着汉族的四处迁徙深入到中华大地的四面八方,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体格局,增强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整体统一性。

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历史发展的纵轴来看,文明发展总是在碰撞、交流、融合中不断前行的。根据考古发掘的器物,新石器时代的文明不仅有交融汇聚的迹象,而且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在不断碰撞交融中,逐渐形成了凝聚核心的文明力量,

进而凝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格局具有鲜明特点,凝聚核心,成员众多,是逐步形成的。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天喻提出,中华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之后,加剧了以汉族为核心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向“多元一体”的凝聚形成,就是中华民族在多元地理和生态环境的中华大地上交流融合、生生不息的历史。其中,生态环境为文明的发展与民族的凝聚提供了重要支撑,二者相互交织,协同演进,这是分析和认知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机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秋月圆共良宵

金朝荣



中秋月圆 刘薇薇 摄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们过中秋佳节又别有一番风味。

彝家儿女世代民族团结一家亲,中秋到来之时,千里彝山不分东西南

北,人不分男女贫富,都要盛情邀亲聚友,共同欢度中秋。在彝族八月太阳历中,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因而中秋也称“仲秋”。八

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月节”“八月节”,故今,彝族人民视中秋节为“大年节”,俗称“彝族年”。中秋之夜,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人们仰望空中明月,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彝族民间过“大年节”,除了有赏月、祭月、吃月饼、饮酒庆团圆等一系列活动外,还要举行朵嘎(毕摩)请月、送月祭祀,吹笙“打跳”(左脚圈舞),火塘对调子(梅葛、酒歌),彝族青年男女“坐相伙”(谈情说爱)等古朴浓郁的民俗活动。更深之时,山寨篝火熊熊燃烧,人们追光逐火聚拢而来,又开始了一场彝寨中秋大比拼——“年中梅葛歌王、舞后”竞技演出。此间,远近前来观赏的彝族人把酒赏歌、纵舞食饼。各家拿出特色菜肴、干果食品,如“羊汤锅”“核桃仁肉蘸蜂蜜”“苦荞粑粑蘸蜂蜜”等一起品尝,中秋月圆,欢歌起舞,其乐融融。

彝族民间有一个关于中秋月夜吃月饼的传说,就是以此情此景油然而生。传说古代每个村寨有一个管寨司,他们欺男霸女,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有一年七夕节,彝山深处,一个卖荞饼的彝族男青年娶妻,新婚之夜,“家鼈子”欲抢夺新娘,新娘挣

脱后跑到山梁跳崖自尽。然而,官府并未追究此案,只是换了一任管寨司住到村中。新郞决意联合村民铲除可恶的管寨司,一天在烙制苦荞粑粑时想出妙计——以苦荞月饼传递信件,共除恶人。于是,他烙制了一个个大荞饼,饼中夹有“中秋子时杀死鼈子司”的绵纸字条,躲过“家鼈子”的戒心盘问后,逐一送到各村各户,有买不起的人家便免费赠送,明报祝福,暗示心机。到了农历八月十五中秋夜,每家都捧出月饼、瓜果祭月。举行祭月仪式之后,人们围坐赏月、吃月饼、饮酒、欢歌跳舞,在最后分食苦荞月饼时,看见字条,便知其意。此时,各村寨的“家鼈子”还蒙在鼓里,村民乘机揭竿“打虎”,于中秋夜子时群起动手杀死管寨司,为彝寨山寨惩奸除恶。这时,人们奔走相告,传递喜报,彝山千家万户闻讯后,如同过年一样燃放鞭炮庆祝胜利。随后,人们为了掩盖地上的血污,从山上采来青松毛铺撒,用青青绿绿取义“亲亲绿绿”,以纪念八月十五百姓获得清平的日子。此后,千里彝山民族民间沿袭成俗,这就是后来人们时兴八月十五团聚吃月饼、过春节(包括彝族年)满地撒青松毛的由来。(作者单位:姚安县文化和旅游局)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李德生：学为廉吏得循声

潮平

李德生(1782年—1852年),字仲惠,号培阶,河南南阳镇平县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登进士第,历任云南定远县(今牟定)、大姚县、易门县知县,镇雄州知州加同知衔,巧家厅同知兼摄东川府、东川府(今会泽县、巧家县、东川区一带)知府。在云南做官20余年,其间任东川府知府10余年。作为四品官员,知府年俸105两,禄米105斛,养廉银3000两左右。然而,在他卒于任上时,他的家人竟连送灵柩回河南老家的资费都凑不够,细究其中原委,做清官循吏,干实事惠民,本就是李德生孜孜以求的事。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李德生任定远县知县,在署衙大堂题:“与民相见”,楹联为:“早坐堂,早结案,早完国课,勤勤慎慎,从此地做去;不想钱,不生气,不纵家丁,安安祥祥,向其中讨来。”李德生言行一致,兴利除弊。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李德生在任定远知县期间“减徭役,省催科,隆学校,修桥梁,纂辑县志;课士勤垦,讲贯不辍;有以小故兴讼者,善语解之,使之帖服感化。莅任六年,定远(今牟定)大治,士民咸戴其德。其间,短暂署理大姚县知县三个月,颇多善政,大姚百姓竟为他立长生禄位。”

探寻李德生一生行迹,勤政爱民、清廉自守、克勤克俭,在处境艰难时也从未易其志。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李德生调任易门县知县,初抵任时遇到重重困难,尤其是在铜政方面压力甚大。他曾经写过一首《易门即事诗》,道出了其当时的心境。

宦迹蓬飞两鬓残,范甯褚笠守儒寒。学为廉吏谙何易,博得循声称亦难。才短愧无新雨露,事忙懒换旧衣冠。何时闲散休归志,平子台前把钓竿。

此诗描述了一位千里为官、四处奔波、两鬓斑白的中年官员,不改读书人的清寒本色,志做清官循吏,常为自己能力不足,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新的惠感到惭愧。因事务繁忙,时常懒得换掉身上的旧衣帽。只希望能有空闲之时,回归山野田园,在河边钓钓鱼、享享清闲。从诗中可以看出,李德生苦闷彷徨,但初心不改,志气不衰。他深入研究铜务,写成《铜政论》,下决心革除弊端,改进铜矿管理办法,经过治理,铜产量得到大幅增长。李德生续修的易门县志《铜政论》中记载:“(易门县)香树坡、万宝、义都三厂,每岁额办铜五十八万斤。”这个数量占了滇省额铜的百分之九,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觑。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德生擢升镇雄州知州加一级,同年10月,又加同知衔。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再次以在易门办铜有功,擢升东川府知府。任职期间,李德生以民生为要,体恤民苦,仁政惠民,深受百姓爱戴。《东川府续志·循吏篇》记载:“知府李德生,性仁爱,教民勤俭,捐置义地,广欠有逃亡者禀请豁免,嗣子孙得以复业,为惠尤巨。”广欠,是由于放本收铜政策中官收余铜定价过低,广民入不敷出,所产余铜不足以抵补已领官本所导致的问题。由于道光年间铜矿衰落,若矿产不高或矿质平常,则“不敷成本,炉户等不特无利可图,而先领之工本又已用去,不能缴还。”“积欠工本之人赤贫无力,是为‘有着广欠’;倘有逃亡,即为‘无着广欠’。当时的东川府矿厂,“大广厂丁六七万,次亦万余人”,由于铜产量萎缩,广欠者不在少数。广欠得到豁免后,受益者众多,李德生此举,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东川府城垣坍塌,李德生禀请重修,并带头捐银,共筹捐银16366两,未动用府库的一两银子,便开始重修城垣。重修后的府城,在原基础上加高三尺,内墙改用方石扣砌,另用净土筑填牢实,较之前更为坚固。另值得一提的是,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东川府巧家厅汤丹厂,百姓为争饮水突发聚众持械斗殴伤毙案,史称“汤丹案”。李德生闻信,经过两个昼夜抵达现场,处置审理。他坚持“但分良莠,不问回汉”,将案件处置妥帖,没有酿成大的事端,受到时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的高度赞赏。说李德生为官不负所学,所办汤丹一案,“谁能如是、肯如是、敢如是”。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李德生请辞,朝廷未批准,继续留任东川知府。清咸丰二年(1852年),李德生以疾终于东川府官邸,享年71岁。为清官,靠操守,更靠坚守;做循吏,要政绩,更要政声。李德生求仁得仁,学为廉吏得循声,受到后人褒扬。《定远县志》《易门县志》《大姚县志》《东川府续志》等志书,以循吏立传,记载其事迹。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第一百八十三卷,以名宦为李德生立传。

(作者单位:曲靖市政协研究室)

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
云南日报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

联办